

经济学如何从古希腊走到当代

■ 郑渝川

经济学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语“oeco-nomicus”，意思是说一家人如何利用手头的资源。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的历史确实不能仅仅从亚当·斯密说起，而要前溯到古希腊等古代文明，毕竟从那时开始就出现了种种经济活动。

今天的经济学家，会经常提到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凯恩斯，这些经济学巨匠的观念深深影响了公共政策和经济实践。但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公共政策的设计者，往往都会颇为尴尬的避开哈耶克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说中，对经济学效仿物理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追求所提出的警告。哈耶克当时说，“经济学家在指导政策方面没有做得更为成功，同他们总想尽可能严格地效仿成就辉煌的物理学这种嗜好大有关系……大众过多的期待，也总会使某些人不顾自己的能力所限，假装或真诚地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以迎合人们的要求。”

英国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史系客座教授、英国政府前经济政策顾问尼尔·基什特尼在谈到哈耶克时就指出，哈耶克毫无疑问反对公共政策过度渗入市场，这使得他长期被边缘化，但他又主张政府要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产品，如基本的教育、失业人口的基本生活，这项主张导致那些崇尚绝对化自由市场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把他看成是叛徒。尽管哈耶克等经济学大师并不信任政府有足够的 ability 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但在经济学的领域，仍然有源源不断的专家加入到公共政策的智库之中，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创造更富裕、更公平的社会。尼尔·基什特尼在



其所著的《经济学通识课》书中提到了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庇古为政府介入具体经济事务的合法性、合理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理由，即市场往往会偏离正确方向，需要由公共部门进行纠偏。按照庇古的观点，政府需要激励“积极”的外部性，而对“消极的”外部性给予抑制，这很容易引申为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再来看

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创者。发展经济学在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里在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得以推行，美国、英国、法国及主流国际经济组织，还有苏联，都为此投入了可观的资源，但收效却并不理想，只有韩国等寥寥可数的几个国家做到了从发展中国家，跃升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发展经济学陷入尴尬，许多发展中国家

几十年来仍未改变贫困面貌。对此，以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解释。《经济学通识课》介绍了弗兰克等人的观点，即不公平的全球贸易和金融秩序，使得穷国被卷入全球化后，利益不断受到损害。弗兰克成功的指出了二战后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困境，但他给出的解释，在经济学界饱受争议。美国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在从过去的殖民地走向新兴独立后，没有建构起保障自由市场运转的良好体制。正是因此，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不惜与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推行军事独裁的皮诺切特合作，帮助后者控制的智利建立自由市场。

《经济学通识课》这本书内容丰富，较为清晰的叙述了从古希腊时期，经过不同时代演化完善，并形成不同流派、不同立场而最终成为公共政策“显学”的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书作者客观公允的评价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贡献，围绕不同时期的经济学重要议题，评析了其提出背景和价值意义，当然也谈及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的局限及争议所在。这本书对于非经济学专业的大众读者，具有重要的“扫盲”意义，可以为读者加深对于经济问题、经济学论点的认知理解提供帮助。

这本书在谈及古希腊时期的经济学论点时，重点评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财产所有权等问题的分歧；接下来，在介绍中世纪时期两位提出了重要经济学论点的哲学家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纳时，书作者指出，

两人的观点是对当时新兴的商业社会作出的适应，即走出了对于金钱的排斥，而强调只要用途正大光明，通过商业获利就可厚非。在引出自由贸易的捍卫者李嘉图时，书作者探讨了当时历史背景下英国选择贸易政策的利益考量。

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论点，长期被认为是冷漠无情的——马尔萨斯反对救济穷人，认为这将妨碍其自食其力，并在不具备养活孩子的情况下，生育更多孩子，给社会造成负担。马尔萨斯也成为了生育控制政策的最早鼓吹者。书作者指出，马尔萨斯的观点存在极大谬误，特别是考虑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增长态势会逐渐放缓，并不会出现其担忧的社会难以负荷新增人口的现象；但马尔萨斯的理论在那些经济发展缓慢，粮食供给得不到满足的贫穷国度中，却得到了可怕的应验。

而今，为了鼓励创新增长，人们开始越来越多的谈论熊彼特。这位经济学家为破坏式创新正名，他也冒着陷入经济学界公敌的风险宣称垄断才能为创新者带来足够诱人的回报。熊彼特的观点大放异彩，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本世纪初，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相继兴起，破坏式创新创造出了巨大成果。《经济学通识课》书中还介绍了如尤金·法玛、乔治·阿克洛夫、保罗·克鲁格曼、丹尼尔·卡尼曼等最近几十年来极大的扩展了经济学边界，或丰富了经济学内涵，并使得经济学及其相关的公共政策争论更加深入的代表性经济学家，以及他们所发表的极具吸引力而又饱受争议的新论点。

经济学研究如何扎根中国？

■ 陈钊

兴趣第一

中国的经济学成长非常快，而我自己的研究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学的成长而逐渐深入的，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做经济学研究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不是需要人有多聪明，而是首先得有兴趣，然后才是需要对一些现实问题拥有一定的敏锐性。

比如我们读本科时，经济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一门“显学”，那时肯去做经济学研究的一般都是对经济学真有兴趣的人。而且我很幸运，我遇到了几个跟我有共同兴趣的同学，那时，我们有四个同学一起在很简陋、有限的条件下，办了一份学生报纸《经济学人》，刊名还是蒋家俊老师题写的。这份报纸现在还在学生中间一届届地往下传。这四个同学，其中的两位主编方颖与丁维莉后来去了匹兹堡大学读博士，现在分别任职于厦门大学王亚南学院和加拿大的女皇大学。其中的两位编辑，我和陆铭，则在复旦读了博士并留校任教。现在想来，当时我们为为数不多的一些讨论、短文、兴趣之雅趣，但却培养了我们对于经济学的兴趣。兴趣真的很重要，有了兴趣才有了后来的坚持。

从现实中找问题

刚开始时，我们也是在不断摸索，在中国做经济学研究要研究什么问题？我们刚深入硕士博士的经济学课程时，一般都是在宏观、微观理论，伴随一些数学模型的推导，这很容易让我们一开始就选择做一些理论的工作。而对我自己触动很大的一件事情是，2001 年我和陆铭正好博士毕业，我们各自把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投给了一个在法国召开的中国经济国际会议，并受邀参会。会上我们才发现，大家更为关心的，不是我们的理论模型，而是关于中国的经验事实：中国的改革到底改变了什么？中国有没有成为为一个市场经济？会上，那些从中国重要现实问题出发而开展的实证研究往往能够引起参会者的极大兴趣。

这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所以我们开始商量和反思到底我们要做什么，随后开始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关注劳动力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现实问题，并逐渐将研究兴趣聚焦

到户籍这一问题上。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牵涉面很广，后来也进一步将研究扩展的城市化。所以，找到感兴趣的，并且重要的研究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

我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本科名校数理高才班毕业，数理模型推导、计算机编程各方面能力都非常突出。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合适的研究题目给他，就让他自己先找题目，然后和我讨论。有一次，他告诉我，本来他认为自己要做最好的一流的研究，所以他要研究美国问题，但是真正尝试这么去做时，他发现自己连人家美国数据库里的数据是什么意思都一知半解。所以，当你连提出问题的制度背景都不知道的话，是没法开展实证研究的。因此，经济学研究想要扎根中国，不管是建构理论还是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都必须了解中国，都要观察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从现实中找问题。那才是你最有体验，最有感觉的地方。

从亲身经历中寻找研究灵感

我最近完成的好几项研究，其实都和我个人经历有关。我曾经做过一个横向项目，关于上海市战略性的扶持政策，那时由上海市经委牵头调研了很多家制造业企业，针对的核心问题就是企业的创新。

我与合作者完成的关于 FDI 溢出效应的研究，就跟这次调研有很大的关系。我为什么想到要研究这个题目呢？一般文献里提到的溢出效应分为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两种。水平溢出是指，比如我是一个外国的汽车企业，我来到中国，我将技术溢出到国内同行本土企业中。垂直溢出是指可能对零部件生产企业（上游企业）或者销售企业（下游企业）有溢出。但是我通过调研发现，恐怕还有一种特别的现象。比如一个汽车外企 A，一个同行的民企 B，还有一个做汽车零部件的本土民企 C。A 不见得会直接影响 B，但是可能会因为政府所下发的配件本土化要求而去购买 C 的零部件，并且向 C 提出很严格的质量与技术要求等。C 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就会相应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效率，丰富产品的种类。一旦有了技术水平提高后的像 C 这样的上游企业，下游的本土企业 B 想要技术升级就容易多了。最典型的是李书福，开始是生产摩托车的，但因为国内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已经发达，所以，他后来可以很快地进入汽车

行业，去造汽车了。所以你看这种溢出效应是迂回的，外企进来通过影响上游企业，转而提高了下游同行企业的效率。

这个发现让我们可以解释之前关于中国 FDI 溢出效应的研究中较难解释的现象。比如，现有研究中，水平溢出效应往往是负的，我们的研究则告诉大家，即使直接的水平溢出效应是负的，但间接的，迂回的溢出效应却是正的。此外，这个研究也让我们可以发现，发展中国 FDI 的溢出效应产生的一个新机制，并相应地告诉决策者，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对其本土化采购的要求是多么重要。

最近，我与博士研究生王阳在大约两年前开展的一项实证研究，验证了“营改增”改革对于分工的促进作用，这个研究的灵感来源也是来自于在上海市的调研。在一次对软件企业的调研中，我发现国内的嵌入式软件不好发展，因为很多企业都是自己研发软件，而不是向专业的软件商购买。这就导致分工的不足。为什么难以进行分工的深化呢？因为存在二次征税的问题。这个故事一直埋在我脑海里，等到后来我发现有很多关于“营改增”改革的实证研究后，我就想，既然这个改革的主要意图是解决二次征税，促进分工深化，那么首先就应该去检验一下，看看“营改增”的税收政策变化是否真正促进了分工。

关注中国特有问题

除了自己的经历之外，中国还有太多的政策问题，可以让我们去研究政策效果，提供一些政策建议。扎根中国的研究必须要了解政策的背景，还有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中国的地理、历史与文化。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地域广大，地区发展差异大，这就带来很多研究课题。

比如，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长江和黄河等河流都是从西往东流，而西部欠发达，东部发达，这就让我有一天突然想到这个客观事实跟治污问题的关系。东部地区治污效果怎样？发达地区在下游，治理水平、监管程度更高，民众对治污的关注度也更高，所以污染企业很可能被赶出去，转移到上游欠发达地区，但是水是从上游往下游流的，所以表面上看污染企业减少了，但是污水还是照样流回来，效果没有想得那么好，甚至会更差，影响的水域会更广。这就是我与合作者们完成的另一项研究工作的主题，这个研究告诉我们，环境政



策的实施效果会由于地区发展水平、监管水平的差异而受影响，甚至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有很大偏差。

当然中国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特色，比如文化。我和陆铭在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迈向社会和谐的城市发展》这本书里收录了一篇关于“方言的回报”的文章。这篇文章来源于一个本科生的想法，他说他想看外地人会说上海话的回报。找我来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个研究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如何寻找工具变量。因为如果你看到一个民工上海话说得好，所以工资很高的话，并不一定是因为上海话带给他更高的回报，而是他个人能力本来就很强，所以，学上海话对他来讲也很容易。这样一来，你看到的就不是说上海话能力的回报，而是无法观察到的个人能力的回报。这怎么办？这可能是这个研究最难解决的问题。但因为我自己是舟山人，说的基本上就是宁波话，所以，我知道对于我这样的外来人口，学讲上海话是非常容易的，这与我的能力无头，只是因为我的家乡与上海同属于一个语系——吴语系。但换一个北方人，再怎么有能力，学上海话还是相当难的。于是，家乡的语言区与吴语的差异，就成了我们寻找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的思路。这就是因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能够接触这样的现实生活，因而更可能从中找到研究的素材。

我所进行的户籍研究

具体到我们新出的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是我与陆铭以及其他合作者这些年来一起做的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户籍的过程中，我有两个感触特别深，写在书的序里了。

首先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事情。比如，外来人口在大城市里工作，就因为没有户口，你却不让他们孩子在这里读小学和中学？这貌似已经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范畴了。是非对错并不必须是经济学家才能给出建议。或者有些问题，经济学家可以给出建议和答案，但是要给经济学家足够的时间。比如说，城市如果排斥无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的子女，让他们感觉处处受歧视，这对他们的身心发展是怎样的后果？真要研究的话，就要进行长期的跟踪调研，但我们恐怕是等不及的。大家想一下，中国的城市首先会进入老龄化社会，服务老人的更大可能是外来人口，他们若是从小时候起没有得到好的

对待，你凭什么要求他们好好对待已是暮年的你？这个问题其实很明显，任何人都能想得到结果。

再举一个例子，有政策说城市太大需要把低端劳动力赶出去。我不赞同将劳动力分为高端和低端，保姆的薪水可能比白领还要高，那谁是低端，谁是高端呢。外来劳动力，你怎么赶？政府还提出来自认很聪明的办法，叫“教育控人”。就是不让子女在城市里接受教育，比如这些城市的农民工二代。但问题是，他们见过城市的繁华，未来可能再回到农村去吗？如果不给他们好的教育、好的发展前景，他们一旦长期逗留在城市中，这对城市的发展有利吗？在本书中，我们仅有的一项理论研究就告诉大家，如果将公共资源分给外来人口，对城市户籍人口不见得没有好处，因为虽然蛋糕有一定的比例分给了别人了，但能够分配的蛋糕却可能因此而变得更大了。

我的第二个感触是，对户籍制度的讨论远远超出了户籍本身。经济学家做研究，都希望把研究说得更有意义，影响更大一些，户籍问题就是这样。我们认为，户籍至少对以下三个重要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城市化问题。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选择怎样的路径？讨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并不是仅仅停留于讨论城市化水平每年要增长几个百分点。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我们更要研究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应该有怎样的空间布局才是合理的？而户籍制度显然会影响人口向大城市化的集聚。

第二，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问题广受讨论，是因为它涉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因为户籍制度的存在，劳动力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因此我们不能机械地去套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试想一下，如果户籍制度的约束能够放松，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潜在劳动力转移出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也会发生变化，这些都会影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

第三，产业升级。创新、竞争力、产业升级，也跟户籍有关。当然我们只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进行简单的制造加工承接全球的生产订单时，问题还不会太大。但是当我们要进行产业升级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质量应该要相应提高。如果户籍制度不能有所改变，那么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就不能充分惠及更多的非本地户籍人口，我们的产业升级就会遇到劳动力技能无法匹配的问题。所以，离开了户籍制度改革背后的城市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我们的产业升级恐怕也难以顺利进行。

▶▶▶ [上接 01]

张宇（1964—）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方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蔡继明（1956—）认为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学习领会其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对他们的观点，我的理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实际出发，是由自己的概念、范畴、核心思想构成的系统性、科学性的理论体系。黄泰岩提出以发展为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则思路更明确、更符合中国实际。他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是

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时代任务，也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需要，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学人必须担当的时代责任。”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必须有中国自己的概念、范畴、逻辑和理论体系，才能显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彰显中国贡献。黄泰岩结合发展经济学理论，就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了不同凡响的探索。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人才严重匮乏，“70”后、“80”后人才严重断档。尽管如此，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发展“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再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一条宽广的经济学发展之路清晰敞

开。洪银兴、黄泰岩等扎根中国实践，形成了“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新常态”。他们致力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勇气是可敬的，他们的创新精神令人钦佩。要开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新空间，为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贡献经济学家的学术智慧，需要一批“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视野超前的思想者，需要一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的领军者。我想，程恩富、洪银兴、黄泰岩等经济学家，只要理论联系实际，联合作战，就能绽放出引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想火花，科学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体系，真正走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理论创新之路。（完）